第 58 卷 第 3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8, No.3
2021 年 5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May 2021

缮写、模勒、板印
——由《白氏文集》流传看抄印转换与文学发展的关系

查 屏 球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摘　要: 元、白在传播效应中看到了自身的价值,有意识利用石刻拓印、木板雕印等各种复制手段,提升传播效应。从九世纪中叶到十世纪末,书籍处于抄印并行阶段,印本生产以官方与寺院为主体,多为实用类或宗教类宣传品,文人别集以抄写为主,全集流传不广,文集的形态也不稳定。白居易在世时,流行于世的多为元和时形成的小集与元白唱和集,五十岁后的作品多不为人知。书籍生产商品化推进了印刷技术普及化,也带来了全集流行的时代,《白氏文集》初刊于宋初,是对多种抄本编辑的结果,固化了白集形态,与抄卷原始形态多有不同。印本降低了文集制作的成本,推动了私人全集的流行,改变了作者的创作观念与阅读者的批评理念。

关键词: 抄本;印本;抄印转化;《白氏文集》
中图分类号: I 207.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21)03-0089-11

由考古实物看,早在七世纪后期武后时就有了印刷之事,但印刷文本的全面普及却是三百年之后的事。从九世纪中叶到十一世纪初,书籍形态已进入了印抄转换阶段,印抄并存一个半世纪后,印本才成为书籍主体。① 文本形态的转变,既缘于这个时代读者对文学文本需求量的上升,也缘于作者对文本流传量的追求。这一转换对文人的创作活动与文学观念产生了相应地影响,形成了与纸抄时代不同的文学意识。同时,抄印转化的完成,也消除了抄本文学的一些原始信息,造成了后世解读的困难。因此,细察印抄并存时代文集流传方式,了解抄印转变的特点,对于具体把握这一时期的文学流向是很有必要的,以下即以《白氏文集》为中心,对此作初步探究。

一、晚唐文本复制需求与抄本文集特色

(一)作者与读者对文本复制需求增大

唐文宗时(826—840),已有民间运用印刷技术的记录,但在整体上仍处于印刷前时代。元稹《白氏长庆集序》有一段话记录了唐代社会对文学文本需求量的上升趋势,并记下其时文学文本的传播方式:

> 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元和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喻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又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

收稿日期: 2020-12-26
作者简介: 查屏球,男,安徽铜陵人,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日韩藏唐诗选本研究》(项目编号:18ZDA249)、贵州社科办孔学堂国学单列项目(项目编号:17GZGX10)成果。

① 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7 页。

云本国宰相每以一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①

上述元白之作流传之广以及社会对这类文本需求之大的情况,还可由以下材料佐证:

孔传《白孔六帖》卷八:胡绡半尺。唐《丰年录》:开成(836—839)中,物价至贱,村路卖鱼肉者,俗人买以胡绡半尺,士大夫买以乐天诗。②

元稹(779—831)、白居易(772—846)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文人,他们的作品非常受欢迎,需求者有长安少年、王公妾妇、牛童马走、商人等,传布的场所包括禁省、观寺、邮候、村学、外国等。白诗可作货币交换,当非稀见物,应有流行量较大的复制品。这里提及了多种复制方式:题壁、缮写、模勒等。

王国维以为此处模勒即指雕版印刷③,今人多认为其时印刷文本尚是历书与宗教宣传物,少见有印制文集之事。《全唐文》卷八七唐僖宗《改元中观为青羊宫诏》中出现了这个词:"须传简册,兼示寰区,以付史官,备令编录。仍模勒文字,告示诸道及军前。"中和元年(881),唐僖宗为避黄巢之乱逃入成都,中和五年(本年改元光启,即885年)还长安,对避难处的元中观加封,改名为青羊宫,并要求史官记录其显灵之象,还要以模勒文字告示诸道及军前。这里的"模勒"应是指一种复制文本的方式,属于拓印之类的事。在宋人文献中,模勒一词出现较多,多与刻石之事相关,如:欧阳修《集古录》所云:"虽其意趣或出于临时,而模勒镌刻亦有工拙。""虽其意趣或出于临时,而亦系于模勒之工拙。④"此处模勒,类似于石刻拓片,与雕版印本原理近似,但工艺与板印不同。

元白为自己的作品被复制与流传而兴奋,他们在其中看到自己的价值,这说明其时的图书市场已成为文人创作活动的一个重要导向。他们不仅渴望得到文本生产群体与传播群体的认可,而且还主动参与这种生产活动。元白二人都好题壁与刻石之事。如李格非(约1045—约1105年)《洛阳名园记》载:"大字寺园,唐白乐天园也。……寺中乐天石刻存者尚多。"宋人还著录了其他多处:

(1)《金石录》卷九:"第1790,唐裴度白居易联句。正书,无姓名。太和三年十二月。"⑤(2)《金石录》卷十:"第1803,唐白居易游济源诗。正书。太和五年九月。冯宿诗附。"⑥(3)《金石录》卷十:"第1813,唐游王屋诗。白居易撰,正书,太和六年十月。"⑦(4)郑樵《通志·金石略·隋唐 唐下》:"白居易与刘梦得唱和。苏州。"⑧(5)《舆地碑记目》卷四《开州碑记》:"盛山十二题诗。唐韦处厚撰。韩文序云:韦侯所为十二诗,其诗其意,以入溪谷、上岩石、追逐云月不足日为事,读而咏歌之,令人欲弃百事,往与之游。和者元稹、许康佐、白居易、李景俭、严謩、温造,于是盛山十二诗与其和者广行于时。"⑨(6)《宝刻丛编》卷四引《访碑录》云:"唐修香山寺诗三十韵。唐白居易

① 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载于朱金诚笺校:《白居易笺校》附录二"序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972—3973页。

② 《白氏六帖》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当出于为宋人孔专续撰。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宝佑丁巳,1257年)外集卷六十四也引此事,当是据此而来。

③ 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收入王国维:《闽蜀浙粤刻书丛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④ 类似的材料还有不少,如,李之仪《姑溪居士前集》卷十七《书陈格石刻》:"乃知模勒之妙有以假借致然。"卷四十一《跋兰亭记》:"贞观中既得兰亭,上命供奉搨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各搨数本"曹士冕《法帖谱系》卷上:"命侍书王著模刻禁中。""奉圣旨模勒上石。"这些材料表明,模勒原指制碑时的一道工序。

⑤ 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页。

⑥ 《金石录校证》,第178页。

⑦ 《金石录校证》,第179页。

⑧ 《通志二十略》,王树民点校清乾隆十四年汪启淑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72页。

⑨ 《舆地碑记目》卷四,第21页。《历代碑志丛书·舆地碑记目》,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粤雅堂丛书本,1998年版,第2—50页。

撰,贺拔基书。”①

元白也多次提及刻石之事:

(1)元稹《永福寺石壁法华经记》:由是僧之徒误以予为名声人,相与日夜攻刺史白乞予文。予观僧之徒所以经于石、文于碑,葢欲相与为不朽计,且欲自大其本术。今夫碑既文,经既石,而又九诸侯相率贡钱于所事,由近而言,亦可谓来异宗而成不朽矣。(《全唐文》卷六百五十四)(2)白居易《吴郡诗石记》云:“今刻此篇于石,传贻将来,因以予《旬宴》一章亦附于后。……宝历元年七月二十日,苏州刺史白居易题。”②(3)白居易《题裴晋公刻女几山刻石诗后》:“裴侍中晋公出讨淮西时,过女几山下,刻石题诗……故居易作诗二百言,继题公之篇末。”③(4)白居易将本集题记刻于石上,置于寺中,其《圣善寺〈白氏文集〉记》后附李绅《看题文集石记,因成四韵以美之》言:“寄玉莲花藏,缄珠贝叶扃。院闲容客读,讲倦许僧听。部列雕金榜,题存刻石铭。永添鸿宝集,莫杂小乘经。”④

凡此皆可证明元、白二人皆重石刻传布之效,对传媒之事颇为用心,这与上文中所述为己诗传播效应而兴奋的情况是一致的。

不过,当时已有“搨纸”一词,元稹的“缮写模勒”或许是时人对其题壁的复制。元白皆好题壁,元自喜己诗“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又如:

(1)《重过秘书旧房,因题长句,时为赞善大夫》:“应有题墙名姓在,试将衫袖拂尘埃”。(2)《蓝桥驿见元九诗(诗中云:“江陵归时逢春雪”)》:“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3)《重过寿泉,忆与杨九别时,因题店壁》(4)《骆口驿旧题诗》(5)《微之到通州日,授馆未安,见尘壁间有数行字,读之,即仆旧诗,其落句云:“渌水红莲一朵开,千花百草无颜色”。然不知题者何人也,微之吟叹不足,因缀一章,兼录仆诗本同寄,省其诗,乃是十五年前初及第时赠长安妓人阿软绝句,缅思往事,杳若梦中,怀旧感今,因酬长句》(6)《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五首》(7)《答微之(微之于阆州西寺手题予诗,予又以微之百篇题此屏上,各以绝句相报答之)》:“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8)《游大林寺序》(9)白居易《三游洞序》:“请各赋古调诗二十韵,书于石壁,仍命予序而纪之。”(10)《吟元郎中白须诗,兼饮雪水茶,因题壁上》(11)《西省北院新构小亭,种竹开窗,东通骑省,与李常侍隔窗小饮,各题四韵》:“题诗新壁上,过酒小窗中。”(12)《花楼望雪,命宴赋诗》:“素壁联题分韵句,红炉巡饮暖寒杯。”(13)《醉题沈子明壁》(14)《感悟妄缘,题如上人壁》(15)《想东游五十韵》:“预扫题诗壁,先开望海楼。”(16)《题岐王旧山池石壁》(17)《往年稠桑曾丧白马,题诗厅壁,今来尚存,又复感怀,更题绝句》(18)《与梦得偶同到敦诗宅,感而题壁》(19)《自罢河南,已换七尹,每一入府,怅然旧游,因宿内厅,偶题西壁,兼呈韦尹常侍》(20)《宿张云举院》:“明朝题壁上,谁得众人传。”

白居易已认识到这类题壁之作有极大的传播效应,如:

《题诗屏风绝句并序》:“十二年冬……由是掇律句中短小丽绝者,凡一百首,题录合为一屏风,举目会心,参若其人在于前矣。前辈作事,多出偶然,则安知此屏,不为好事者所传,异日作九江一故事尔。”“相忆采君诗作障,自书自勘不辞劳。障成定被人争写,从此南中纸价高。”

《答微之(微之于阆州西寺手题予诗,予又以微之百篇题此屏上,各以绝句相报答之)》:“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与君相遇知何处,两叶浮萍大海中。”

他们已从传播的效应中得到了自信,这种大众化的传播不依傍权势地位,也不须得到王权的特许,但反响更大,更让他们感到兴奋,因此,他们又主动利用模勒等复制技术推动己作的传播。

(二)手抄文集以选集性小集为主

其时流行的元白作品也多是“元白酬唱集”之类“小集”。如《酉阳杂俎》所记“葛清刺青”一事就是

---

① 《宝刻丛编》卷四11页。《历代碑志丛书·宝刻丛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光绪十四年十万卷楼刊本,1998年版,第1—422页。

② 《白居易集笺校》卷六八,第3663页。

③ 《白居易集笺校》卷三十,第2053页。

④ 《白居易集笺校》卷七十,第3770—3771页。

如此:

> 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肤挠,自颈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成式常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记。反手指其札处,至“不是此花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又“黄夹缬林寒有叶”,则指一树,树上挂缬,缬窠鏁膝绝细。凡刻三十余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为“白舍人行诗图”也。①

前一首诗是元稹的,见于《元稹集》卷一六作于元稹及第之初。《白氏文集》卷十四有《禁中九日对菊花酒忆元九》:“赐酒盈杯谁共持,官花满把独相思。相思只傍花边立,尽日吟君咏菊诗。”题下有注:“元九云:‘不是花中唯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白诗作于元和五年(810),本年元稹为江陵府参曹,白居易在左拾遗翰林学士任上。后一句见于白居易《泛太湖书事寄微之》,全诗十六句,其中有句:“黄夹缬林寒有叶,碧琉璃水净无风。避旗飞鹭翩翻白,惊鼓跳鱼泼刺红。”作于宝历元年(825),白居易时任苏州刺史,元稹在越州为浙东观察使,两诗皆是元白唱和之作。《白舍人行诗图》应取自当时流传的“元白唱和集”,如《继和集》《三州唱和集》之类②。葛清误以元诗为白诗,原因有二,一是白居易后来名气高过元稹,民间在传抄“元白酬唱集”时,仅取白居易名,命诗集为《白舍人集》,另外元稹诗附于白居易诗注中,也易使两者混抄。在抄书时代,文人作品多以选集方式流行,本集全集并不多见。这事发生约在大和四年至大和六年之间(830—832),虽然,早在长庆末(825)《白氏长庆集》五十卷、《元氏长庆集》六十卷(或一百卷)已经编定,但是,对于多数读者而言,他们能接触到的仍是这类小集。③

(三)手抄小集文本不稳定

手抄文本多属手工随机行为,同样的作品抄于不同时间或抄于不同之手都会有变化,文本准确性、规范性甚难保证。如笔记小说里所引用的白诗多与本集有异,原因就在此。如:

> 《太平广记》卷六十九:时严休复、元稹、刘禹锡、白居易俱作《玉蕊院真人降》诗……白居易诗云:“瀛女偷乘凤下时,洞中暂歇弄琼枝。”(出《剧谈录》)//《白氏长庆集》卷五十五《酬严给事(闻玉蕊花下有游仙绝句)》:“瀛女偷乘凤去时,洞中潜歇弄琼枝。”

其中“暂”“潜”或因形近而误,“凤去”与“凤下”似属不同版本,“下”字比“去”更有表现力。

> 《北梦琐言》卷六:其集内有诗《挽元相》(《太平广记》作“哭元相”)云:“相看掩泪俱无语,别有伤心事岂知。想得咸阳原上树,已抽三丈白杨枝。”//《白氏长庆集》卷三十六《览卢子蒙侍御旧诗,多与微之唱和,感今伤昔,因赠子蒙,题于卷后》:“早闻元九咏君诗,恨与卢君相识迟。今日逢君开旧卷,卷中多道赠微之。相看掩泪情难说,别有伤心事岂知。闻道咸阳坟上树,已抽三丈白杨枝。”

两诗题目有异,《挽元相》或《哭元相》肯定不是原题,因为元稹卒时已不是宰相,这是在传抄过程中为人简化后的新题。孙光宪可能未见过《白氏文集》中的原诗,引诗不仅诗题有变,原诗为七律,也被简化成一首七绝,且有文字之异,“俱无语”与“情难说”、“想得”与“闻道”、“原上”与“坟上”,都应出于不同手笔。

> 《太平广记》卷四十八:(白公)《及答李浙东》云:“近有人从海上回,海山深处见楼台。中有仙笼开一室,皆言此待乐天来。”又曰:“吾学空门不学仙,恐君此语是虚传。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即应归兜率天。”(出《逸史》)//《白氏长庆集》卷三十六《客有说(客即李浙东也,所说不能具录其事)》:“近有人从海上回,海山深处见楼台。中有仙龛虚一室,多传此待乐天来。”《答客说》:“吾学空门非学仙,恐君此说是虚传。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即应归兜

---

① 段成式:《酉阳杂俎校笺》,许逸民校笺,北京:中华书局 2015 年版,第 627 页。

② 《崇文总目》卷十一记有《元白三州唱和集》一卷。

③ 参见宇文所安:《唐代的手抄本遗产:以文学为例》,卞东波、许晓颖译:《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五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36—266 页);任雅芳、查屏球:《纸抄时代文集编纂、流传方式与文学的传播——以李白诸小集到正集衍变过程考察为中心》,《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2 期,第 20—27 页。

率天。”

“仙笼”应为“仙龛”之误，“开一室”与“虚一室”，“多传”与“皆言”应是不同时期，不同的文本。

《太平广记》卷二八二：元相稹为御史，鞫狱梓潼，时白乐天在京，与名辈游慈恩寺，小酌花下，为诗寄元曰：“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时元果及褒城，亦寄《梦游》诗曰：“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千里魂交，合若符契也。（出《本事诗》）//《白氏长庆集》卷十四《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

“当酒筹”与“作酒筹”，也因是传写之别，与《本事诗》同时的《才调集》所录也为“当酒筹”，显然，这也是一种流行文本，“作酒筹”可能是编定文集时才改的。

流行的传抄文本多有省略原本的情况，趋简尚易是流行文本一大特色。故传抄本多省略了作者自注或过长的诗题。其次，为求流传的效率，文本复制者也会对原文作简易化处理。随着科举阶层的下移，阅读人群的增多，复制文本需求量增大，名家之作多成为流行读物，文本生产与复制的商业化程度也越来越强，并形成一轮轮的流行文化思潮。流行文化催化了文本复制技术的进步，而复制技术的提升也促进了流行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这一点在印本与流行文化关系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四）抄本成本昂贵，制约了流传

现存一些文献记录了其时的书价，据此可推断出《白氏文集》等书大致的价格：

1. 敦煌经卷附注：《药师经》一卷酬资一吊，《大涅梁经》一部四十卷，酬三十吊，《法华经》一部七卷，酬十吊。（按：一吊合钱一千文，平均论，约合一卷一千文）①

2.P .2912：写《大般若经》一部，施银盘子叁枚（共三五两）、麦壹佰硕、粟五十硕、粉肆斤，施上件物写经，谨请炫和上收掌，贺卖充写经直纸墨笔自供足，谨疏。四月八日弟子康秀华。②（按：《大般若经》约 600 卷，35 两加上粮食，也近有 50 两，接近一卷一两）

3.《宣和书谱》卷五载：（唐文宗时）（文）萧拙于为生，彩鸾为以小楷书《唐韵》，一部市五千钱，为糊口计。（《唐韵》五卷，一卷千钱）

在读书识字为贵族垄断的时代，书价也是贵族化的。抄卷大致价格是一卷一千钱，《白氏文集》七十卷，全书抄本价约在七八万，差不多是一位五品官员一月的收入③。这对一般读书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虽然，晚唐至五代，崇白之风日趋兴盛，但多数学人仍难以读到《白氏文集》全部，所了解的只是选本，并不了解白居易在舍人之后官职与诗作，仍是将之视为“白舍人”。如，徐夤《徐正字诗赋》卷二有《追和白舍人咏白牡丹》一诗，前文引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中已言白居易登第之后其赋已作为科场范文广为传抄了，事过百年，徐夤仍以此为教材，还以“白舍人”称白居易。又如，徐铉（916—991）撰《稽神录》中有一故事：“江南陈浚尚书自言：其诸父在乡里好为诗，里人谓之陈白舍人，比之乐天也。”④徐铉《稽神录》序言书成于宋之前，所记陈浚为南唐初人，其乡里是江西南昌一带，其父是唐末人，乡人称之为“陈白舍人”，而非“陈白少傅”“陈白宾客”之类高职，既表明“白舍人”一名在民间影响更大，也是因为不了解白氏全书及白居易晚年以“香山居士”“醉吟先生”自况的诗文。

---

① 又，“敬写大般涅盘经一部，三十吊；妙华经一部，十吊；大方广经一部，三吊；药师经一部，一吊”。黄永武：《敦煌宝藏》第 99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6 年版，第 310 页。

② 刘半农：《敦煌掇英》，黄永武编：《敦煌丛刊初集》第 15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5 年版。

③ 白居易元和十年任江州司马作《壁记》言：“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后为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也说，“俸钱八九万”。

④ 吴仕臣《十国春秋》有陈浚传：“陈浚，庐陵人，父岳仕唐为南昌观察判官，著《唐统纪》一百卷。”

二、抄印并行时代私集的印行

(一)早期印刷文本生产非私人行为

唐末五代,社会动荡,百官十不存一,原来的抄写系统与书籍制作机制根本无法维持,也无法满足社会对书籍的需求。正因如此,后唐长兴三年(932)冯道才提议雕印九经。事实上,唯待官方参与后,印本形象才有所改观,由商家俗物上升为正宗读本。书籍生产进入了抄印并行的时代。梳理印刷史料可发现早期印刷之事多为官方行为,私家印书不多,以下几例皆是如此:

其一,后唐天成二年(927)国子监印《贞观政要》。宋汪应辰(1118—1176)《文定集》卷十《跋贞观政要》记载:“绍兴三十二年八月偶访刘子驹于西湖僧舍,出其五世所藏之本,乃后唐天成二年(927)国子监板本也。”

其二,后唐长兴三年(932)国子监刊九经。宋王溥《五代会要》卷八《经籍》记载:“后唐长兴三年(932)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秩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①这是中央教育机构首次以雕版印刷的方式发行统一教材,是官方最高学术机构对这种新型文本形态的肯定,提升了印刷文本地位。

其三,后蜀(940—957)印《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记:“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890—960)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②

其四,十世纪中叶后钱越大量印刷佛经。《莲宗宝鉴》卷四记:“(释延寿)师念世间业系众生,不能解脱,惟念佛可以诱化,乃印弥陀塔十四万本,劝人礼念。”《宋高僧传》卷二十八记:“释永安,姓翁氏,温州永嘉人也。汉南国王钱氏召居报恩寺,署号禅师焉。乃以《华严论》为会要,因将合经,募人雕板,印而施行。”③近代出土了很多吴越印刷品,以《陀罗尼经》为多:1924 年八月于杭州雷峰塔内发现有《宝箧印陀罗尼经》,卷前题云:“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乙亥为宋太祖开宝八年(975)。类似的经卷,在湖州、绍兴与安徽无为也有类似的发现。印制时间从 956 年到 975 年。④

仅由刊印的数量与流传的范围看,至十世纪中叶,蜀中、洛汴、吴越地区的书籍印刷已达到相当的规模,书籍已开始进入了印刷时代。初期所印之书多是学校教材与佛教经典,因为这类书籍面向大众,需求量较大,可保证印刷活动的费用。个人别集如白集、杜集等是无法与之相比的,故南北二王子仅以抄写方式保存《白氏文集》,这一状况至宋中期,读者群空前扩大后才有所改变。其次,早期印刷活动多为官方或寺院之事,印刷之事是一系统工程,涉及抄、校、刻、印多种工序,参与人员较多,既需要专业技工,还要有读写能力者,故这种书籍生产方式早期并非私人行为,毋昭裔有心刊书也须待其富贵时,就是缘

---

① 《爱日斋丛钞》卷一:“《通鉴》:后唐长兴三年(932)二月辛未,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定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后周广顺三年(952)六月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此言宰相请校正九经印卖,当是前长兴三年事至是二十余载始办。田敏为汉使楚假道荆南,以印本五经遗高从诲,意其广顺以前五经先成。”

② 宋如璋《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九亦有详记。

③ 又,吴越时期水心禅院住持道诜亦曾制《往生西方净土瑞应删传》印本,见张秀民:《五代吴越国的印刷》,《文物》1978 年第 12 期,第 74—76 页。

④ 《安徽无为宋塔下出土的文物》(《文物》1972 年第 1 期,第 77 页),张秀民《五代吴越国的印刷》(《文物》1978 年第 12 期第 74—76 页),金志超《浙江碧湖宋塔出土文物》(《文物》1963 年第 3 期,第 24—29 页),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11—212 页)。

于此。这表明在抄印并行的时代,大规模刻印文集之事还未兴起,私家文集仍靠抄写流存,抄本与印本并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二)时文教材的商品化刺激了文集的印行

唐人好将科场成功者之作作为时文教材,在抄写机制遭到破坏后,印本教材就渐渐流行起来,早期印行的文集多具有时文教材功能,且印集多是逐利者的商业行为,如:

> 徐夤《徐公钓矶文集》卷六《自咏十韵》言:"只合沧洲钓与耕,忽依萤烛愧功成。未游宦路叨卑宦,才到名场得大名。梁苑二年陪众客,温陵十载佐双旌。钱财尽是侯王惠,骨肉偕承里巷荣。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

本诗作于徐夤进士及第十二年后,时间约在 904 年,诗言其赋当时即被人刻印出售了。

> 孙郃《玄英先生传》言:"先生有诗集十卷,弟子杨弇编之,予请王赞舍人为之序,序成将以付梓云。"①

方干(号玄英)约卒于光启四年(888),孙郃"唐末为左拾遗,朱全忠篡唐,著《春秋无贤人论》,即脱冠裳服,布衣归隐于奉化山,著书纪年悉用甲子,以示不臣之义"。② 其文也当作于归隐不久。据此看,方干集被刊是在后梁之前。

>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郑准讥陈咏》记:"(陈咏)其诗卷首有一对语,云:'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鸟点头行'。京兆杜光庭先生谓曰:'先辈佳句甚多,何必以此为卷首?'颖川(陈咏)曰:'曾为朝贵见赏,所以刻于卷首章。'都是假誉求售使然也。"

此事与上述方干诗集事时间相近,应是唐昭宗时代(888—904)的事,印本的模式与商业运作特点已经影响到文人对文集的编撰。

五代末期,约在十世纪三十年代后逐次增多。其时三大文化中心西蜀、南唐、汴宋都有刊印私家别集之事,如:

> 昙域撰《禅月集序》记:贯休卒后,"葬事既周,哀制斯毕,暇日或勋贤见访,或朝客相寻,或有念先师一篇两篇,或记三句五句,或未闲深旨,或不晓根源。众请昙域编集前后所制歌诗、文、赞,日有见问,不暇枝梧。遂寻检稿草及暗记忆者,约一千首,乃雕刻成部,题号《禅月集》……时大蜀乾德五年(923)癸未岁十二月十五日序"。

此记表明抄本转化为印本,不等于原样复制,而在事先有一个收集、编辑加工程序,主事者需对各类抄本进行整理。

>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刘绮庄歌诗》四卷,《唐四库书目》有《绮庄集》十卷,今所馀止四卷,诗三十二,启状四十四而已,惜其散落大半,其本乃南唐故物,纸墨甚精,后题曰昇平(元)四年(940)重题印其文云云。"

昇元四年已是重印了,初印当更早。二百年后,晁公武仍称其纸墨甚精,不足百年,雕版印刷技术已大有进展了。

> 《旧五代史》卷一二七《周书·和凝传》记:"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焉。"《新五代史》卷五六《和凝传》亦记载:"为文章以多为富,有集百卷,尝自镂板以行于世,识者多非之。"

印刷物在当时多是商贾牟利俗物,和凝刊书之举与贵为国相者的身份不符。又,印刷之书,其初只限于

---

① "付梓"一词在宋前很少见,此处或为后人改定。然而,不排除方干集在唐被印的可能性。王赞《玄英集序》言:"余为儿时得生诗数十篇,心独好之,生时尚存,地远莫克相见,其后生名愈籍,为诗者多能讽之。"方干集曾作为时文教材流行,有可能被商家刊印出售。

② 吴仕臣《十国春秋》卷八十八。

得到官方肯定的儒家经典,自编自印,则是越过社会认可程序的自我宣扬,故为人不齿,但此事表明已有文人利用印刷技术传布自己的文集。

(三)印本价格下降,全集流行

相关文献表明印本书的价格约是抄本的十分之一,如,日本慈觉大师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开成三年(838)在扬州“买维摩《关中疏》四卷(印),价四百五十文” 。每卷价一百一十文左右。如果印数增大,成本还会更低。如,范成大《吴郡志》卷六记:“时[嘉佑(1056—1063)]方贵杜集,人间苦无全书,(王)琪家藏本雠校素精,即俾公使库镂版,印万本,每部为直千钱,士人争买之,富室或买十许部,既偿省库羡余,以给公厨。”杜集二十卷,值千钱,每卷五十元,说明到宋中期,印本书价已有大幅度下降,仅为抄本的二十分之一。白集仅需三千五百元,这应在普通读书人的承受范围之内了。

三、印刷技术普及化与白集的印抄转化

(一)在印抄并行时代,大型全集仍以抄本为主

白居易甚惜己集,数度编辑,最后分藏五处:洛阳胜善寺、苏州南禅寺、庐山东林寺、外孙家、侄子家,并规定只可在寺抄读,不可带出寺外,但不到半个世纪,家无传人,传承不明;在洛阳寺院者历水灾、战火后多已不存;苏州南禅寺藏本为日本僧人慧萼抄到日本流传,原本渐亡;存东林寺者,为军阀杨行密抢夺后又失。原集不存,因此,在白居易卒后不到一个世纪,南北差不多同时开始重新抄写。

先是杨吴王子德化王杨澈抄录《白氏文集》补藏庐山东林寺,匡白在杨吴太和六年(934)作《江州德化东林寺白氏文集记》言:

> 洎唐之季世,兵火四起,向来之美,殆为煨烬馀,是固知东林者其已坠焉。(德化令公大王)常于白集,是所留情。俄膺天命,秉旄钺出抚江城。……曰:“白傅尝谪为邦典午,及访之遗迹又洗然,忆东林等有其集焉。”又询诸老僧,咸曰:“执事者不勤,翦无遗矣!”王咨嗟良久,顾谓诸辈:“何疏慢之若是?亡斯宝耶。”然于胜事颇殷……时太和六年岁次甲午(934)八月己巳朔十二日庚辰。

杨吴德化王杨澈是杨行密第六子,武义元年(919)被封为鄱阳郡公,于乾贞元年(927)又被封为平原王,后改为德化王。他在九江为政时让人重新抄录《白氏文集》七十卷,补藏东林寺中。宋人陈舜俞《庐山记》卷二也记录了此事:

> (白居易)至太和九年为太子宾客,始以文集六十卷归之,会昌中(842)致仕,复送后集十卷及香山居士之像。广明(880—881)中,与远公《匡山集》并为淮南高骈所毁,吴太和六年(934)德化王澈尝抄誊以补其缺,复亡失,今所藏,实景德四年(1007)诏史馆书授而赐者。

杨澈能让人抄录全集入藏,表明《白氏文集》七十卷本已在世上流行,但此后不到七十年,这一重抄纸本也不存在了,至宋真宗时再重抄补藏,足见抄本流传之不易。

再者是后唐王子李从荣抄补白居易家藏本,时间与杨澈抄本相近。宋庠(996—1066)《元宪集》卷五《过普明禅院(唐太子少傅白公旧宅)二首》之一有言:

> 自昔仁为里,于今福作田。清风残竹地,宝色故池天。绘象成真侣(乐天旧影与蒲禅师偶立),家声入梵缘(又常自称香山居士),一披龙藏集,无复叹亡篇(后唐明宗子秦王尹京曰特写公文集一本,置经中,至今集本最善)。①

诗中所说的“龙藏集”就是“李从荣抄本”,宋敏求(1019—1079)《春明退朝录》卷下记:

> 唐白文公自勒文集,成五十卷,后集二十卷,皆写本,寄藏庐山东林寺②,又藏龙门香山寺。高骈镇淮南,寄语

---

① 宋庠:《元宪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版。

② 白居易《东林寺白氏文集记》《圣善寺白氏文集记》分记太和九年六十卷本、开成元年六十五卷分藏之事。

江西廉使,取东林集而有之。香山集经乱亦不复存。其后履道宅为普明僧院,后唐明宗子秦王从荣又写本寘院之经藏,今本是也。后人亦补东林所藏,皆篇目次第非真,与今吴蜀摹版无异。①

李从荣是后唐有实权的王子,以好文闻名,于长兴元年(930)为河南尹,其抄写白集约在此时。李从荣抄本在洛阳一直有传,后周时陶谷(953)作《龙门重修白乐天影堂记》言:“有文七十五卷,导平生之志。”其所见者当为李抄本。南北二王子差不多同时整理白集,都采用了抄写的方式,说明即便有印刷之事,在他们仍有“抄重印贱”的观念,认为抄写更能表达对《白氏文集》的尊重。当然,这与其时印本质量不理想或需求量不大有关。他们的抄本与白居易手订本已有不同,这也体现了抄本文献不稳定的特点。

(二)《白氏文集》抄印转换过程

现知白集最早刊印的年代,应在 1037 年之前(见下文),但不排除更早的可能,如:

《春明退朝录》卷中记:李文正公罢相为仆射,奉朝请,居城东北隅昭庆坊,去禁门辽远,每五鼓则兴,置《白居易集》数册于茶镣中,至安远门仗舍,然烛观之,俟启钥,则赴朝。雍熙二年(985)三月,诏:中书申后两棒鼓出,枢密院申后四棒鼓出。②

这里所说的《白居易集》数册,而不是数卷,这应是册页装的书,而册页装的书多为印刷本。据此推断《白居易集》印本的出现可能在雍熙朝(984—987)之前。白集最早的刊印记录是保存在成书于 1259 年日本《管见抄》之“刊记”:

详定所准景佑四年(1037)正月十六日转运司牒,准礼部贡院牒,准敕令指挥毁弃遥伪、浮浅、俚曲、秽辞并近年及第进士一时程序文字不可行用者,除已追取印板当官毁弃外,有《白氏文集》一部七十二卷可以印行,今于元印板录略。详定官将仕郎守杭州司法参军李藏、详定官将仕郎秘书省校书郎权杭州观察推官毕京③、重详定朝奉郎太常博士通判杭州军州兼劝农同盐司舶事林莫。④

上文提及的底本“元印板”,应是在景佑四年(1037)前出现的印本,可能就是宋敏求所讲的“吴蜀摹板”。现知杜甫集最早刊印的时间是嘉佑四年(1059),与此差不多同时,印刷发展到这一阶段,大型文集才开始了抄印转换。

上引“刊记”所列“详定官”“重详定”人员中,包括司法参军、校书郎、太常博士等多位官员,故这种大型文集的刊印不是个人行为。当时,宋庠以李从荣抄写的《白氏文集》最善,宋敏求言东林寺本“与今吴、蜀摹版无异”,吴蜀版底本可能是杨澈重抄的东林寺本,是后人在刊印时重新编辑的文本,篇目顺序与原本自有不同,所以,宋庠才言其“篇目次第非真”,而据此重印的景佑四年本与原本的距离自然更大了。白居易《白集后序》记录了在前集之后逐次增补的方法,日本所存抄卷明确标明所增篇,[ ]内为刊本所无者:

元微之编次文集而叙之,凡五帙,每帙十卷,讫长庆三年(刊本作“二年”)冬,号《白氏长庆集》。迩来复有格诗[五十首]、律诗[三百首]、碑志序记表赞[共十首],以类相附,合为五轴(刊本作“卷轴”)。又从五十—以降,卷而第之。是时大和二年秋,予春秋五十有七,目昏头白,衰也久矣。拙音狂句,亦已多矣。由兹而后,宜其绝笔。若余习未尽,时时一咏,亦不自知也。因附《前集》报微之,故复序音:卷首云尔。⑤

---

① 《东斋记事　春明退朝录》,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42 页。
② 《东斋记事　春明退朝录》,第 32 页。
③ 《宋诗纪事》卷十二:“毕京,京官职方员外。”录有《和范公希文怀庆朔堂》诗,应是与范仲淹(989—1052)同时代人。
④ 《管见抄》,日本公文书馆藏抄本。
⑤ 日本东大寺藏《白氏文集要文抄》。

抄本编辑单位有帙、卷,前集共五帙,每帙十卷。现存日本江户刊本那波本是依古抄卷刊印的,其目录卷首曰:“白氏长庆集五帙五十卷。”而目录正文却标明:第一帙七卷、第二帙七卷、第三帙七卷、第四帙七卷、第五帙七卷(实际是八卷)、第六帙七卷(实际六卷)、第七帙七卷。之后又标:后集,第八帙七卷、第九帙七卷、第十帙七卷。基本上是一帙七卷,与其序所说的“一帙十卷”并不同,显然,“五帙五十卷”,应是抄本原文残留于印本之上的文字,而目录正文是新编之后重设的。这仍可表明抄本在向印本转变过程中,并不是对抄本的照相式复制,它有一个加工过程,更多的是对多种抄本的选择与编辑。如李白、杜甫集也都是合诸本而成的。《郡斋读书志》卷四上云:“白旧集十卷,唐李阳冰序,咸平中乐史别得白歌诗十卷,凡歌诗七百七十六篇,又纂杂著为别集十卷,宋次道治平中得王文献及唐魏万所纂白诗,又裒唐类诗洎刻石所传者通李阳冰、乐史集共一千一篇,杂著六十五篇,曾子固乃考其先后而次第之云。”又,王洙《杜工部集记》云:“搜集中外书凡九十九卷: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孙光宪序二十卷,郑文宝序《少陵集》二十卷,别题小集二卷,孙仅一卷,杂编三卷,除其重复,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诗三百九十有九,近体千有六。起太平时,终湖南所作。视居行之次若,岁时为先后,分十八卷。又别赋笔杂著二十九篇为二卷,合二十卷。”所述也是这一情况。故以今传刊本推定其最初状况不尽准确。

(三)刊本对《白氏文集》的固化

《白氏文集》七十卷成书不是一次完成,白居易先于元和十年(815)编成十五卷诗集,十年后再编五十卷文集,再逐次增为五十五卷、六十卷,六十七卷、七十卷、七十五卷,在其生前本集是动态的。在《白氏文集》印本化之后,经刊印者整理与编辑,这些动态信息都消失了。现存最早的宋绍兴刊本《白氏文集》已不是五十卷加二十卷的前后合集,而是前诗后文集,已将前后集混合重编了。宋敏求指出宋初有多种传本:(1)“今本”的祖本是李从荣再抄本;(2)据东林寺藏本所作的增补本;(3)吴蜀刊本;(4)接近原书的古本,嘉佑杭州本的底本。前三者为同一系列,即重编后的前诗后文本,后一种为更原始的前后集本。然而,前诗后文本较早刊印,传布更广,影响更大。宋绍兴(1131—1162)刊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北京古典文学刊行社 1955 年影印)即承此系统来,并将补遗部分合并为一卷,成七十一卷本,成为宋之后最流行的白集刊本。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马元调据宋绍兴本整理再刊,成为明清时的流行刊本,原始的“前后集本”反不为人知了。

日本平安入唐僧惠萼于会昌四年(844)将苏州南禅寺收藏的《白氏文集》七十卷本抄录回国①,日本金泽文库所传之丰原奉重抄本,抄于 1231 年,所据底本与会昌四年惠萼抄本有着直接相承的关系,这一点可于各卷转录的惠萼手记中见出。所以,这一古抄本更多地保存了抄本时代《白氏文集》原貌,留存了手抄文本在向印刷文本转变中已丢失的信息。仅由形制看上,粘接成的长卷,保持着一卷一轴的形制,其长度近十米,显然不能手持阅读,仅供查阅之用,此事也证实了上述所论,能够阅读全集仅是少数人。宋人七十卷刊本传到高丽,至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朝鲜出版铜活字本(甲辰本),后又据活字本再补刻,即为朝鲜板刊本。日本元和四年(1618)那波道圆据朝鲜刊本而刊印成的活字本(那波本),保持着“前后集”形制,成为日本江户时代主要流行的传本。前后集分集本与前诗后文合编本,既有原始与后编之别,也反映了不同时期读者对《白氏文集》的接受方式,在前后集形制里,《后集》二十卷,多为白居易晚年作品,故晚年白居易的“醉吟先生”“香山居士”的老人形象也就更加突出。刊本固化了文集的形态,不同的刊本也固化了人们关于白集的不同认识。

综上所述,《白氏文集》,约在十世纪末至十一世纪初才被版印流行。对于多数人来说,全集是抄印转化后形成的新理念,这一理念不仅对文集编纂方式,并且对文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宋前文集

① 此事见载于《善邻国宝记》,详见日本广岛大学陈中教授《慧萼东传〈白氏文集〉及普陀洛迦开山考》(《浙江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5 期,第 44—54 页)。

编纂多是分类编目,此后编年意识越来越强,以致有了一官一集的编纂法。印刷大幅度降低了制作文集成本与流通成本,文人既能印制个人全部作品,读者也能读到一人的全部作品。全集的流行,使得文集的功能也发生了改变,文集不只是显示文学才华,供人欣赏的读本,而且是记录人生、交流思想的一种方式。依据编年排序解读作品,读者可认识到作者心路历程以及作者所记录的时代,而不只是关注各体艺术技巧。抄本时代的文集研究以唐人《文选》学为代表,无论是李善注还是五臣注,多关注于辞义章法,其研究方法多移植了儒家注经之法,但因少全集观念,较少将作家研究纳入其中。印本化之后,全集流行,编者与读者可将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研究法全面运用于别集研究。如计有功《唐诗纪事》三十九卷中专列出"白居易年谱",之后陈振孙又撰《白文公年谱》,皆是缘于有全集可资。这一点在研究杜甫中最为突出。杜集最初可能是分类本,但宋人重编者多以编年本为注。编年已成为宋人研究杜甫、韩愈、白居易的主要内容。这是全集刊本化之后出现的新思维,也应是唐宋文学转型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

Hand-written Copying, Molding Printing and Wood-block Print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Hand-written Copying into Printed Copy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Observed from the Circulation of *Bai Juyi's Anthology*

Zha Pingqiu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Zhenyuan (贞元) period under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De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唐德宗), the number of readers increased greatly. Yuan Zhen (元稹) and Bai Juyi (白居易) noticed their own value as a result of the propagation effect, and consciously applied various copying techniques like stone rubbing and wood-block printing to enhance the propagation effect of their works. It was not until 300 years after the appearance of printing techniques that printed books started to get popular. From the mid-9th century to the end of the 10th century, books were made by both hand-written copying and printed copying. Printed books were mainly produc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emples, with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m for daily use or for religious purpose. The literati's collected works were mainly made by hand-written copying. Their complete works were hardly circulated on a wide scale. And the format of their anthologies were not fixed. When Bai Juyi was alive, only a small collection of his works written in the Yuanhe (元和) period under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Xian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唐宪宗), and *the Collection of the Serial Versifying Between Yuan Zhen and Bai Juyi* (《元白唱和集》) were broadly circulated, while most of the works that he wrote after the age of 50 were unknown. Thanks to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books, printing technology got popular and a new era of complete works commenced. *Bai Juyi's Anthology* (《白氏文集》) as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his works wa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It was an outcome of the editing of various hand-written copies, which led to its final fixed format and differentiated it from its original format in many aspects. Printed copying greatly cut down the cost of the production of an anthology, thus promoting the circulation of personal anthologies, and changing the authors' views of writing and the readers' views of reception and criticism.

Key words: hand-written copy, printed copy, transformation of hand-written copying into printed copying (抄印转化), *Bai Juyi's Anthology* (《白氏文集》)

(责任编辑　郑　园)